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陈其泰

内容提要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

关键词 章学诚 学术视野 “道”与社会实践 学术史演变 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 乾嘉学术

《文史通义》的著述宗旨：
“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

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与刘知幾所著《史通》向来合称为古代“史评双璧”，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两部书在史学评论上都有重要建树。但二者又有显著的不同，《史通》专讲史学，《文史通义》则对“文”与“史”作贯通论述，非单纯史学评论所能限。

古人著书，往往以一篇篇短论编辑而成，虽分成若干卷，或称为内外篇，但不明其体系，也少有畅述撰著宗旨者。《文史通义》内篇共有 71 篇短论，分为 6 卷。各卷并未言其中心内容为何，全书也无“前言”之类作概述。所幸者，章氏本人有鉴于其学术在当时罕得有人了解，故在所写书信序跋中，曾一再特别讲到一些揭示《文史通义》撰述宗旨的话，甚为宝贵。试举两段：

《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诂，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喙置之。^①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至于史学义例，校讎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②

可见《文史通义》的撰著宗旨，论述史家史例是一项重要内容。但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即“文史校讎之业”、“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此校讎，实与乾嘉朴学家所操的版本、文字校勘之业大不相同。章氏使用这一提法的内涵，既指学术分类方法，更指评论学术源流、学术主张和治学方向的得失，其主要意义，是评论学术演变、著述的利弊得失和学术风尚的趋向等。他所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是要从学术史的渊源流变来商榷其利病。故既申明“专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又强调“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也”，即要从探讨文史著作的得失利弊，进而讲出对学术风气、时代特点、社会价值的看法。

正由于此，需要我们深刻地领会。《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心血所萃，书的命名，实寄托其

睿思和深意,表明他与乾嘉考证学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取向。试对其书名四字加以诠释:

“文史”——指古今著作之林,古今之学术;又指打通文史作研讨、评论,其评论的范围,包括经、史、子、集。

“通”——指以贯通的、发展的、有分析的眼光作考察。“通”在传统学术中是极高的境界,司马迁著《史记》以“通古今之变”自期,成为不朽之作,为后世学者所仰慕,《史通》、《通典》、《资治通鉴》等名著均以“通”命名,章学诚也以“通”作为本人高悬的目标。

“义”——即思想、观点、义旨,以此作为评价学术之得失、高下的主要标准。

简要言之,《文史通义》的著述宗旨,就是以贯通的眼光,为古今学术商榷利病,而将学者的观点、识见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成一家言,以达到学术经世的目的。章学诚在写给钱大昕的信中曾作痛切陈言,同样为此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故比者校讎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③在当时考证学风靡于世的时代,章学诚所确立的目标更高,思考更加深刻。《文史通义》这部积累了章氏一生发愤为学的名著,为我们展现了异常广阔的学术视野,包括对“道”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探索,对学术史演变的反思,对烦琐考证学风流弊的大力针砭,对改革历史编纂方向的倡导,以及关于学者修养和治学之道的论述,议论风发,见识卓越,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而且确实达到了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为我们留下极其珍贵的思想财富!

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

“道”是传统学术的最高范畴。其内涵,包括要探求世界的本原,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的指导思想等。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无疑是既具有历史哲学意义、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课题。但在当时群趋于史

料考据的时代风气下,学者们对此却不加措意,甚至不屑为之。《原道》上中下三篇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章学诚时年五十二岁,该文是代表其晚年学术思想的成熟之作。文稿传出之后,却招来许多讥评,指责章氏之作“题目太熟”,“重蹈前人窠臼”。实则前人之所作,虽与章学诚撰写的《原道》篇名相同,旨趣却殊异。《淮南子·原道》讲文章要以儒家的“道”来指导,要体现“道”。韩愈著《原道》篇,则是宣扬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性。章学诚在及时得知“同志诸君似皆以为不可”,“都门知己俱有此论”的情况下,却毫不气馁,他在致友人的书中表示坚信《原道》三篇在当时学术环境下所具有的开创性价值:“鄙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窠。”^④

章学诚如此自信,确有道理,《原道》三篇确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首先,章学诚在思想史上首次鲜明地论证了“道”的实践性,有力地破除长久以来阻碍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道”的神秘观念。他论述,“道”源于社会实践,逐步演化发展,“渐形渐著”越来越明显、复杂。人类从草昧初开、很小规模的群居时代开始,就必须解决生产分工和生活分担的问题,那时就开始有“道”。到后来,群居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复杂,就逐步产生君臣制度、行政区划、封建制度、教育制度,“道”也就越来越发展。由此,他强调“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⑤

这是当中国历史处在大变革的前夜,所提出来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认识论的极其重要的命题。章学诚的论述很朴实,而所分析的道理却很深刻。他用“三人居室”作比喻,来论证“道”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囊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

而事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⑥

章学诚的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论证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根本意义的“道”,并非圣人头脑里所固有,是对于世代儒生因对圣人顶礼膜拜而形成的神秘观念的有力驳论。这不仅在学理层面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命题,而且在现实层面对于端正学风和发挥学术经世作用意义深远。章氏的论述,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礼论》中的朴素唯物观点,而又更为深刻,达到更高境界,是讲作为理论核心和社会法则的“道”,如何因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推动,由草昧初开时代逐步演化发展。所以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评价说:他好像洞悉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⑦

同样具有深刻意义的是,章学诚论证了“道”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有力地破除了“道”是凝固不变的旧观念。让人们真正认识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他生动地用车轮和车辙来作比喻:“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制作,一如暑葛寒裘,犹轨辙也。”说明作为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段轨迹。他又总结“道”如何演化、发展“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天纵之圣”、万世师表,众庶视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之伟论!他又明确要求当代学者应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开发前蕴”,“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明大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学者治学的重心和目的,应放在关注生产和生活实践,总结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方针、办法来。

章学诚所揭示的真理性认识,确实勘破了千

百年来从未有人探讨之处,其开拓性价值,我们可以从大梁本《文史通义》^⑧所作的若干删改,获得直接的证据。如:

《原道上》:“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大梁本却改为“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删去了“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而此十字却是关键之处,说明道是由社会生活内在的自然趋势所推动而产生的。

《原道上》:“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大梁本将全句删掉。而此句正是要害所在,是章学诚对将“道”视为圣人头脑所固有的神秘化观念所作的有力驳论。

《原道中》:“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大梁本将句子中的“非”改作“不”。此处如按大梁本作“不如”,则语意产生歧解。“不如”,可有二义:(一)不像,不同,(二)比不上。若以第二义,则与章学诚原意正好相反。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章华绂为何要作这样的修改呢?是因为担心其父惊世骇俗的言论,招致世俗人士的不满,所以要削其思辨性的锋芒。这不正证明章学诚提出的新命题、新表述所具有的开拓性、超前性价值吗?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是与其对儒家经典提出的一系列的新见解直接相联系的。对《尚书》《诗经》等经典,历代儒者顶礼膜拜,视为万古不变的教条,一代一代不知疲倦地进行训诂、笺注,总不能跳出考证、疏解的范围。章学诚却有更开阔的视野,他是用审视的眼光重新诠释,从中得出新观点、新结论。《文史通义》中列在全书之前的《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各篇,就是他对经典重新审视的成果。

章学诚所作的重新诠释,摆脱了旧的经注式的窠臼,为经学研究开辟了新路。《文史通义》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意义尤为深刻。这一命题,鲜明地回答了:儒家经典并非是圣人头脑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古代治国实践的产物。“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

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换言之,“六经”中的“道”和“理”,都是与古代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切相联系的,“六经”乃是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录。以“六经是先王之政典也”来解释《诗》《书》《礼》《春秋》等经典,应是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讲阴阳变化的《易》,为何也是“先王之政典”呢?答曰“其道盖包括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典章政教之先矣”。^⑨因此《易》不但与五经同为政典,具有“与史同科”之义,而且《易》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

章学诚所倡论的“六经皆史”命题的深刻内涵,强调六经是历史的记录、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说明必须坚决摒弃将六经神秘化的观点,而应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它、研究它。在章学诚的时代,学者们乐此不疲地竞相从事的,是用训诂音韵或版本校勘的方法对儒家经典做笺注、整理的工作,而绝少思考经典的思想价值、经典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仅如此,当时还盛行“经尊史卑”的思维定势。典型的例证是,惠栋治学,尊信汉儒经说,主张“凡古必真”,“惟汉是从”。戴震治学的特点,按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概括的,则是“以肆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⑩。江藩还慨叹说“近时讲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⑪正是有感于此,钱大昕在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写的序中,议论的重点,即批评当时流行的“经正而史杂”的观点。他指出,古代经史不分,中古以后经史分途,但未见有陋史而荣经者。自宋元之后,才有重经轻史的风气,“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呵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者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⑫这段议论,从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评论学术的价值标准两方面,严肃批判当时支配士人头脑的思想定势,指出空洞的议论、穿凿的说法,即使依附于经,也毫无价值,而轻视史学的风气是极不正常的,应予扭转。而现在,章学

诚恰恰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趋势,在《文史通义》首篇中更加明确、响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重要命题,倡言应树立经典是古代治国经验的记录的新观点,应从经典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新角度去发掘和阐释其内在价值。这种新的学术视野不仅扩大了史料范围,还提高了史学地位,具有要求经史平起平坐的意义,而且预示了要把经典置于历史学科考察范围之内的近代化学术取向。

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六经就不再是盲目崇拜的对象,而是应放在历史条件的范围内进行客观研究的对象,这就为经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叶瑛先生在《文史通义校注》中称“《文史通义》本为救当时经学之流弊而作”,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若联系稍后龚自珍的主张和20世纪初王国维的学术实践,就可以清楚地认识章学诚为经学研究开辟新路的意义。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一文中,提出了“六经者,周史之大宗”的著名论点“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日用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同时他尖锐地批评长期形成的“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的旧观点。至20世纪,王国维被誉为“新史学之开山”,其治学的特点,按照其弟王国华的概括,就是“以史治经”。他强调王国维治学与前人“以经治经”的不同“并世贤者,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俱不外以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⑬“以史治经”,把儒家经典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其他史料来研究,这正是学术近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正是这一趋势的发端!

《文史通义》中《易教》以下各篇,都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如《礼教》篇,针对朴学家研治礼经只能拘守于文献整理范围,从事明类例、考同异一类工作,他强调应以哲理为指导,提高礼学研究的层次。“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并指出“真

能知来者,所操甚约,而所及者甚广。”勇于从事“开发前蕴”的创造,则礼学也成为经世之学,必将开辟出新的境界。

《文史通义》内篇中《书教》《诗教》等篇,也都能突破旧套,创辟新说,下文中将予论及。

对学术史演变的审视

由于章学诚在哲理探索上达到较高的层次,以及其确立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旨趣,章学诚在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大力针砭烦琐考证学风的流弊、彰显“史义”的指导作用、探索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等重要问题上,都作了极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提出一系列迥异于流俗的卓见。

关于对学术史的审视,可以举出《诗教》《浙东学术》《朱陆》等篇略作分析。

《诗教》上篇探讨的是战国诸子学说与六经的关系,以及专门著述何时开始出现的问题。章学诚首次提出,从学术史考察,战国为一关键时期,“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章学诚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证。首先是,战国诸子争鸣,他们都得六艺之一端,然后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如,老子言阴阳变化,来源于《易》;邹衍侈言大九州之说、关尹推衍五行相生之说,来源于《书》;管子、商鞅推行法制,来源于《礼》。再而章学诚提出,战国诸子汪洋恣肆的文章,“其源多出《诗》教”。因为,从春秋、战国典籍的大量记载说明,春秋堪称是《诗》的时代,春秋行人,深明《诗》之比兴、讽喻之义,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熟习诗篇而又灵活运用以达其旨。战国纵横之士,推衍而敷张扬厉,正是行人辞令运用以达之极致,“委折而入情,委婉而善讽也”。再次,他从学术史的演进总结,得出文章、学术的发展,战国是一大关键时期的结论。因为,战国以前,“未尝有著述之事”,世官职守而文字记载合而为一。“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至战国而后著述之事专。如《论语》,主要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问答,基本上是简短的对话记录,到了孟子,才有铺陈闳肆的文字,此乃“著述至战国而专之明证也”。以上章学诚对春秋战

国时期学术史演进的总结,贯穿了学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其见解很受20世纪学者的重视。罗根泽在其所著《诸子考索·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即明显地发挥了章学诚“战国前未尝有著述之事”的观点。

《浙东学术》是章学诚总结学术史变迁的又一代表作。此篇首次梳理出晚明以来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一脉相承的“浙东学派”的系统,概括出黄宗羲以下学术的特色,表彰学术史上朱、陆、顾、黄等名家虽宗旨各异而互相推重的风范,批判门户相争的恶劣风气;同时提出作者本人关于“史学经世”等认识的重要学术宗旨。叶瑛先生在《文史通义校注》中称,此篇“作于嘉庆五年,实斋时年六十三,殆其晚年定论也”^⑭。说明叶氏也对本篇重视。

《浙东学术》讨论了宋代以来学术史变迁三个层面的重要问题。一是,论述清代浙东学术的渊源,理出明末至清初“浙东学派”的统绪,以及从顾炎武、黄宗羲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风范。章学诚梳理出“浙东学术”的源头和传习,揭示出自刘宗周、黄宗羲以下,其学术特征是“宗陆而不悖于朱”,既重视个人修养,又重视通过研治史学以总结治国的经验。其后至万斯同、全祖望,学术前后相承,而又能摆脱门户之见。尤其是清初浙东学派名家黄宗羲与浙西学派名家顾炎武,学术各有渊源,却“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清代浙东学术源远流长,以及传承人物摒弃门户之见而尊重其他学派成就这两大特点,实在值得揭示和发扬。二是,章学诚进而总结浙东学术的精髓所在:言天人性命必切于人事;讲性理与精研史学相结合,“言性命必究于史”。三是,揭示出总结“浙东学术”优良传统的现实意义,鲜明地主张“学术经世”,有力地针砭当时盛行的“舍今而求古”的烦琐考证学风和“舍人事而言性天”的理学空谈。

《文史通义》中评论当代学术史的重要篇目,还有《朱陆》和《书〈朱陆〉篇后》。关于《浙东学术》、《朱陆》、《书〈朱陆〉篇后》三篇,《文史通义》两个版本的对待和编排序次甚不相同。章氏遗书本把《浙东学术》排于“内篇二”,在《原道》、《原

学》、《博约》诸篇之后,并与《朱陆》、《书〈朱陆〉篇后》三篇集中排在一起,显示出评论、总结学术史之内在联系及《浙东学术》篇之重要性。编排极具识见。大梁本则将《浙东学术》编在“内篇五”,与编在“内篇三”之《朱陆》遥相隔开,了无关系,《书〈朱陆〉篇后》又不予选入。如此处理,既大大降低了《浙东学术》篇之重要性,又失去将当代学术史作为一个单元评论的意图。

《朱陆》篇探讨的同样是理学盛行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回答如何恰当地对待朱子的学术,以破除长期以来因陷于门户相争而形成的错误认识。

章学诚认为,朱陆两派各有长处,不应偏袒一派,否定另一派。“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朱子偏于道问学,陆氏偏于尊德性,他们各有学说体系,各有思辨的智慧,都为理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章学诚强调,宋代的朱陆之争,与今日的门户相攻,表面相似,实则大不相同。宋代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伯厚(王应麟)诸公承朱学授受,博学多闻,尊今服古,他们攻陆氏空言德性为虚无,确有其理由。今之攻陆者,是荒俚无稽之学究,这些人持“必须博学”作为进攻的理由,其所言与其不学浅陋之所业正好相反。他们自命为朱子一派,实则与朱子之博学于文根本无相似之处,却煞有介事地攻陆王,只不过是伪陆、王攻真陆、王。

章学诚进而论述:朱子学术,本来本末兼该,做到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术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宋代朱子的一传、再传弟子本有好的传统。“如黄(榦)、蔡(元定)、真(德秀)、魏(了翁),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淳儒,其于朱子足以立教矣。”但现之借口奉朱子以攻陆王者,乃是一些陋儒,其特点是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对陆、王若不共戴天。其实他们是把通贯古今、经纬宙之朱子,歪曲成为村陋无闻、傲恨自是之朱子!此类实为伪陆、王者,表面上却自谓学朱且奉朱,这是给朱子的学术带来羞辱,也是学

界的一种病症,应当明其危害,痛加贬斥!

本篇的又一重点,是含蓄地批评戴震。章学诚认为:戴氏学问本是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他的学问有成就,乃是得力于继承朱子的宗旨,“服古通经,学求其是”。他学问得力于朱子,却攻击朱子,这是耍弄自己的小聪明而意气用事,“生乎今世,因闻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今服古之绪嗣其意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之后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后人在前人基础上能有超出前人之处,本是应该如此,可是竟然忘记是依靠前人之遗蕴,可知见识不足,自不量力。章学诚讲出本人内心的忧虑:伪陆王者攻真陆、王,其学猥陋,危害性小;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如果不从学术史来分析判定,根据其言行来对照审视,那么因此人学力深沉,其危害就大了,“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因戴氏学问深厚,声誉极高,其攻朱子,易使人受其影响。故章氏认为必须辩明真相。他又进一步申明,戴氏使用的手法是,不敢公然形之笔墨,而在日常言谈中肆意贬低,这就造成更严重的危害。“其人之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章学诚深为慨叹:朱子之授人口实,多半出于《语录》。然则,朱子《语录》即使有失初旨之处,但从总体看,朱子表里如一,这是古代大学者的一致风格。现今贬低朱子者,恰恰不能表里如一,其人格不如朱子远甚,那又有何理由责备朱子呢!

为了对以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申论,章学诚继之又撰成《书〈朱陆〉篇后》。大梁本对此篇未予选入,并不是无意间漏选,而是不理解此篇对于总结乾嘉时期学术史的重要价值,因章学诚敢于讲出别人所不敢言的话,而使章华绂心存忌惮。^⑮章学诚认为,如何认识戴震的学问和为人,对于乾嘉时期学术,有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一是,如何

评价戴震的学术成就,其学问的精髓何在?二是,戴震的性格有其复杂性,有些言说在其身后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有必要讲清楚事情的真相。

戴震是乾嘉考证学中皖派的代表人物,精于训诂、校勘、文献整理,兼擅历算,同时他又撰有义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因此,戴震的学术,实则包涵两个方面:一是,精于考证之学;另一是撰成哲学著作,力辟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在思想史上具有战斗性的意义!戴震尖锐地批判理学家否定情欲之说,有力地论证情欲是人生之本能和天然合理的要求,满足正常的情欲需要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孟子字义疏证》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无不达,斯已矣。”^{①⑥}他揭露理学家歪曲孔孟的学说,将个人的臆想假称为“天理”,作为扼杀人的正常情欲的借口,结果祸害无穷“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轻言之。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①⑦}戴震愤怒地斥责尊者、长者、贵者动辄以“理”责罚卑者、幼者、贱者,“理”成为迫害无数无辜者的工具,这就是“以理杀人”,他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中,戴震进一步廓清理学家“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谬论“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①⑧}

上述戴震揭露、剖析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谬说为害民众酷烈的实质,是乾嘉时期发挥原始儒学朴素理性精神、回答时代课题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戴震本人对此极为重视,在致段玉裁信中曾说“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

不作。”^{①⑨}他中肯地指出情与欲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存在,保证人的情欲依照其自然的逻辑发展,国家才得治理,社会才得安宁,如果禁绝性情、遏止情欲,就等于壅塞仁义,堵死社会发展之路。这就在根本上揭露了理学家维护纲常名教而扼杀人欲、人情,恰恰与“理”背道而驰。在当时,虽然道学家已经声名不好、屡遭讥笑,但理学仍是朝廷提倡的官方哲学,像戴震这样敢于在著作中对理学的根本理论支点作激烈的批判,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他前后撰写《原善》初稿、《原善》卷上中下修改稿、《孟子字义疏证》,还有致朋辈书信多篇,反复辨析,可谓推陷廓清,痛加驳斥,竭尽全力!也足以证明这一理论批判的迫切需要和戴震的强烈责任感。戴震的学生洪榜撰《戴先生行状》,他对戴氏的学说深有体会,故在《行状》中除了推崇戴氏的考证学成就之外,又综合了戴氏《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答彭进士允初书》等重要著述,概括其驳斥理学家谬误说教的精辟论述,郑重地予以表彰。

可是当时士林人物,包括大考据学者朱筠、钱大昕等,却对戴震的学术思想不理解,他们认为考据才是戴学的“绝诣”,而戴氏著《原善》等哲学著作,是“空谈义理,可以无作”,甚至指责为“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而章学诚对于评价戴震学术别具卓识。章、戴二人在修地方志和评价郑樵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章学诚却不顾个人恩怨,大力推崇戴震的哲学成就,推评他是“乾隆学者第一人”。章学诚曾在《答邵二云书》中,称本人“知戴甚深”,并说“当时中朝荐绅负重望者,大兴朱氏,嘉定钱氏,实为一时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及见《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仆于当时力争朱先生前,以谓此说似买椟而还珠。”《书〈朱陆〉篇后》开篇便赞誉说“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又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之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学

诚一再讲,“深见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这是对戴震学术的极高评价。前一句,是指戴氏能深刻把握孔孟学说的精义,并予以创造性地发挥;后一句,是指戴震《原善》等篇剖析事物的本质,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戴震才能居于“乾隆学者第一人”。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章学诚又指出,戴震的品格、行事又有明显的缺憾。篇中说“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排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章学诚这些议论,与其视为妒名争胜的表现,毋宁说是为了澄清“神化”戴震的不正常学术气氛,还戴氏其人“既是豪杰之士,也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形象。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佐证。段玉裁是戴门巨子,在考证营垒中成就卓著,理应一本“实事求是”、“戒盲从”的原则治学、行事。但在其所撰《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谓“先生于性于天道,了然贯彻,故吐辞为经。”“经”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神圣地位,现称戴氏“吐辞为经”,这不是将他“神圣化”的确证吗?《年谱》中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记载:“(戴先生)又曾言‘文有二种:一则题如大坚石,作者用大于石之铁椎,一椎粉碎,此一奇也。一则用口气一吹嘘,便使大石软如绵,飞舞空中,飘堕无迹,如我此作是也。’”^{②1}这更是戴氏自我吹嘘到神乎其神的地步了!证明戴震在一些场合下确实“神化”自己,并造成周围一些人对之盲目崇拜。更证明章学诚对他的批评并非出于杜撰,也不是妒名争胜,而是严肃地指出当日学术界存在的应当正视的问题。^{②2}章学诚既高度评价戴学的“绝诣”,又严肃指出戴震身上存在的弱点,对于正确认识乾嘉时

期学术的走向,都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由于章学诚立志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要将“文”“史”打通研究,所以他具有远远超出于考据学者的开阔视野,对于战国时期学术、朱陆异同、浙东学术以至乾嘉时期学术的源流变化的得失利病作出深刻的总结,他所作的一系列论述和分析,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给后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彰显“史义”的指导作用 为史学发展开新路

由于章学诚重视哲理的探求,善于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善于总结学术风尚的源流和得失利病,因此他不仅能对学术史的演变作出中肯的总结,而且在历史编纂领域内能够清醒地认识史学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大力倡导革除积弊,开辟新路。

《史通》和《文史通义》同是传统学术中对史学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名著,由于两者撰写的背景不同,而关注的重点和预期解决的任务也互有不同。刘知幾所处的时代,史学发展的势头显著,尤其是,两晋南北朝至唐初六百年间,纪传、编年二体史书大量撰成,其内容、史识、体裁体例运用及史料采集、剪裁等有优有绌、参差不齐,亟须要做总结、评价和提出历史编纂范式的工作。章学诚则处于传统史学的后期,面临着总结史学演进的新问题。一是,当时处于考证学盛行的时代风气下,学者们所重的是搜集史料、训诂考证、文献整理一类工作。如梁启超所言,“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②3},士人视考证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如有探求义理者,则拱手而相谢,表面谦虚实则排拒、轻视。对于治史和著史,严重地忽视“史义”的指导作用,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传统未能得到发扬,治史者往往以史料的纂辑、考订为满足。因而成为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亟须廓清这种醉心于琐屑考订的不良学风,重新树立重视“史义”、“史识”指导作用的价值导向。二是,自唐中后期以后,纪传体正史体裁一直沿用,自《旧唐书》至《明史》,一共修成九部,其中有撰修认真,因而获得较高评

价的,也有一些因仓促成书、舛误甚多,而备受讥评的。至此亟须在理论上加以评析。三是,自南宋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以后,至清代蔚成大观,这是史学发展的新现象,那么对这一新的史书体裁的特点应如何评判?对其发展趋势应如何预见?对于这些有关学术发展的重大问题,章学诚都有放的放矢,深刻地加以辨析、评价,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开拓了学术发展的广阔前景。

章学诚强调“别识心裁”对于文字撰述的指导作用,他将浩如烟海的古今载籍,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论述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他利用《易经》中“圆而神”和“方以智”的思想资料,引申而论云:

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②3}

章学诚提出区分“撰述”、“记注”两大层次,确实令人一新耳目。这一新的概括,彰显“史识”在撰修史书上的指导作用,有赖于它,才能使史书达到“撰述”的高层次,保证其“传世而行远”。如果忽视义理、观点的指导,终日局限于纂辑史料、整齐排比的工作,就只能居于“记注”这一较低的层次。同样为了强调“史识”、“义理”的指导作用,他在《浙东学术》的篇末提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只有用观点统帅史料,以“别识心裁”作指导而纂成的史书,才能称为“史义”、“史事”、“史文”相统一的“史学”。

而与此相联系,章学诚又提出区分“功力”与“学问”的命题,对于醉心琐屑考证的学风进一步作有力的针砭:“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②4}

章学诚对阐释以“撰述”和“记注”区分古今载籍,对“功力”与“学问”的辨析,都是为了彰显“史义”、“史识”的指导作用,对沉溺于琐屑考证

的学风流弊作有力的针砭。他的努力,就是为了使学者们树立新的价值观念,抛弃“襞绩补苴”的旧习,跳出狭窄的范围,把眼光投向“学术经世”、“鉴往知来”的广阔天地,因而预示了学术风气的转变。

在历史编纂学领域进行理论总结,是章学诚关注的又一重点,其主要贡献是,从贯彻“史义”指导作用的高度,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的得失,痛陈当前历史编纂所面临的困境,提出改革的方向,为史学发展开辟新路。《文史通义》中《书教下》、《史篇别录例议》等名篇的撰写目的,就是要挽救“史义”被淹没的严重积弊。对此,他说得很明确:“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作为也。”^{②5}史义被淹没,便是“史学废绝”。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于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盛行,史家的别识心裁和创造力被窒息,造成了史学的灾难。章学诚指出由于后代修史窒息了史家的别识心裁,造成祸患无穷,更是打中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要害所在。

为何纪传体沿用了千余年,人人习以为常,不思改易,而章学诚却看出它弊病丛生,非思挽救不可呢?就是因为他确立了思想观点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主张独创,勇于革新。不但能敏锐地发现旧事物的弊端,而且能敏锐地发现新事物的活跃生命力。他目光如炬,发现并且高度评价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上的独特作用。尽管明清两代已经产生了多部纪事本末体史著,但它究竟有何优胜之处?对于历史编纂的全局有何作用?人们对此仍处于若明若暗之中,章学诚则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

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

章氏如此高度评价这种新体裁的优点,其出发点在于反映客观历史需要,在于救治历史编纂出现的严重弊病,故又言“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滥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②6}

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②7}并且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篇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并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自如的优点,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囊括丰富的内容。20世纪初年章炳麟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当时他已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立场,撰写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二是为了振厉士气,鼓舞斗志。他苦于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进化论观点的通史体例,最后在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他改革史书编纂的办法,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②8}。还有与章炳麟同时尝试撰著《中国通史》的梁启超,和此后撰著《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以及20世纪末发凡起例、主编完成《中国通史》浩大工程的白寿彝先生。这些著名史学家前后所做的理论探索和著述实践,恰恰证明章学诚提出的主张,

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编纂学内在逻辑发展之方向。

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了“史德”、“知人论世”评价历史人物和“立言为公”等命题。他在《史德》篇中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益以人也。”^{②9}刘知幾论史家应具有“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加以大大发展,提出“史德”,并专门写了文章,此项贡献,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的,“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件具有很重大意义的事”^{③0}。章学诚讲“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是强调史书记载要符合历史事实,不要掺杂私人感情和偏见。因为史书要靠人写,而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这些很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刺激影响,“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③1}。章学诚又讲,评论古人应设身处地,包含有结合历史条件去考察的意思。他针对有人称司马迁“为讥诽之能事”,“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的片面说法,强调司马迁著史的主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肯定其高尚志趣和卓越史识;又指出他因遭遇不幸而“不能无感慨”,但跟“怨诽”根本不同^{③2},得出了相当公允的结论。在《文德》篇中,他又强调“不知古人之世,不能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这些论述,正好符合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评价人物和事件的原则。章学诚又著有《言公》篇,主旨是讲著作家应该坦诚无私、严格律己。章学诚认为,著述的出发点必须是“诚”,抒写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文辞是用来恰当地表达这种“诚”的形式。“学者有事于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③3}怎样做到坦诚无私呢?章学诚论述了两项,一是摒弃猎取名誉的虚荣心,二是根绝表里不一的虚伪心。章学诚现身说法,论述树立“经世”的目的和责任心,才能力戒私心胜气和虚饰欺瞒,这对于著述者何等重要。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要之,章学诚对于历史著述,都强烈地要求树立高度的责任心,以求客观地再现历史,实现“学术经世”目的,这些都标志着将

传统史学理论推进到了新的境界。

至此,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简要的总结: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将之互相紧密联系起来,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对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当代的学术风尚进行考察,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在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在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章氏生前,其学术不为他人所了解,被视为“怪物”“异类”,但他毫不气馁,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志向,勇敢地探求新知,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敬佩。此外,他在针砭当时学风的流弊,在推进方志学的发展,在论述学者的修养和治学之道等方面,也都有精辟的见解,本文限于篇幅,未能论及。章学诚学术的主要局限,一是尊古太甚。尽管他天才般提出“道”是永远前进的车轮,应当总结时势的新变化而推进大道等出色命题,但又未能完全摆脱世代儒生形成的三代是黄金时代、古圣王先总结的“道”尽善尽美这类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他对《尚书》中《金縢》《顾命》两篇所具有的纪事本末的最初的创意,也推崇过甚,称为“上古神圣之制作”^⑭。又一明显的局限是,他所能凭藉的思想资料过于有限,由于在他所处的时代,物质生产领域的变化和学术思想领域的变化,都未能达到质的飞跃,都未能为他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新的话语系统,以至尽管他探索的诸多命题都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超前的,但他的论著中却不得不采用大量的“中古”式语言。再次,与此相联系,章氏所处的时代是“近代”社会的前夜,学术系统化、体系化的进程尚未正式展开,因而章学诚许多闪光的思想尚散落在其论著中的各个短篇以及所写书信序跋之中,需要我们加以重新组织起来,方能反映出其学术思想的逻辑系统。但上述局限主要都是由于时代条件所造成,并不影响其探索范围之广

和学术造诣之深。对于章学诚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我们无疑应予高度重视,并作更深入的探讨。

- ①④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陈鉴亭论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311页。
-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334页。
-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523页。
- ⑤⑥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4页。
- 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7页。
- ⑧《文史通义》有两种版本。一是章学诚临终前,将一生撰写的全本文稿托友人萧山王宗炎为之编校,后由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刊刻的《章氏遗书》(又称《章学诚遗书》)本,刻于1922年。此版本征辑较完备,有主要著作《文史通义》,有《校讎通义》,有论方志文章(包括所修方志序跋等),有章氏其他文章。一是章学诚次子华绂所编大梁本,1832年刻于河南开封。两种刊本相较,有两项不同:一是《章氏遗书》本的外篇,系选录学诚与友人书信、为友人文集著作写的序跋、解答别人问题的文字、在书院教导学子的言论等,这些文章都可与“内篇”之内容相发明。而“大梁本”之“外篇”所收者为章氏有关方志叙例的文章。这些对于理解章氏学术思想体系来说,关系相对小一些。但章华绂在“大梁本”序言却言王宗炎校定本“多与先人原编互异”。王宗炎在章学诚临终前受托为其编定文稿,说明章氏对其完全依赖,故无理由怀疑他擅自增加文字。对照两种版本,文字有不同者,显系大梁本有所删略或改动。故叶瑛在校注本“例言”中批评他“则亦未必尽得先生意也”。二是“大梁本”内篇缺了《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六篇,故其内篇的篇目也不甚完备。本文所引用的古籍出版社《文史通义》和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均是依据《章氏遗书》本整理。
-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 ⑩江藩《汉学师承记(一)》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
- ⑪《汉学师承记(二)》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 ⑫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注》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5~886页。
- ⑬王国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 ⑭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5页。
- ⑮关于此篇写作缘起,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有论及,“实斋此篇(按指《朱陆》篇),即为东原而作。时东原犹未卒,故文中隐其名。后又为《书后》一篇,始明说《朱陆》篇为正戴而发,则东原下世已十余年矣。”又说“《书后》亦似成于己酉,与《原道》诸篇同时。《姑熟夏课甲编》所谓附有

- 旧稿一篇,即《朱陆》,又加以《书后》也。”《朱陆》当撰于乾隆四十三年以前,《书〈朱陆〉篇后》当成于乾隆五十四年。
- ①⑦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41、4~5页。
- ⑧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9页。
- ⑨戴震《与段若膺书》,《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6页。
- ⑩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页。
- ⑪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戴震之《屈原赋注》,是将朱熹之《楚辞集注》改头换面,以为己作。云“盖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人专己自信……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点窜,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之名著,尚不难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参见《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8~429页。
- ⑫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4页。
- ⑬⑭⑮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古籍出版社

- 1956年版,第13、15、15页。
- ⑯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 ⑰《和州志·志隅自叙》,《章氏遗书》第36册,外篇卷一六,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 ⑱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95页。
- ⑲章炳麟《脩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 ⑳㉑㉒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44~145、145~146、146~147页。
- ㉓白寿彝《说六通》,《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 ㉔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中》,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页。

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潘 清)

《周书》校读札记(二)

黄 楼

1. “赐武杂彩一百段”(《周书》卷一九《达奚武传附子震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06页)

“武”,《北史》卷六五《达奚震传》、《册府》卷八四五作“震”。按《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周书》亦作“震”,则《周书》原与《北史》同,今本《周书》作“武”乃后人所改,此字可回改。

2. “宣帝即位,进封扬国公,拜大司空”(《周书》卷二〇《王盟传附子懋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35页)

《北史》卷六一《王盟传附子谊传》作“武帝即位,累迁内史大夫,封扬国公。”则王谊封扬国公时间,两书一作武帝即位时、一作宣帝即位时。按,《周书》下文载武帝时王谊平汾州稽胡叛乱,因功“封一子开国公”。北周勋爵制度,若本身爵位已高,战功无合适爵可授,则可回授子孙。武帝时王谊已可回授一子,早已位至国公,《周书》“宣帝”乃“武帝”之误。

3. “璨,开府仪同三司、宜阳县公。”(《周书》卷二〇《贺兰祥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39页)

“宜阳郡公”,《北史》卷六一、《通志》卷一五六《贺兰祥传》作“宣阳郡公”。《周书》原校记一八“宋本、南本和《北史》本传‘宜’作‘宣’。张元济云‘宜阳县,北魏属

义州,疑‘宜阳’是。”今按,宣阳县失考,但北魏曾以奚斤子和观为宣阳侯,此作“宣阳郡公”未必为误。罗新、叶炜《新出汉魏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所收《贺兰祥墓志》云“次子粲,字吴提,宣阳县开国侯。”墓志与《北史》可相印证。故知,《周书》“宜阳”乃“宣阳”之讹,张元济所云不确。

4. “就拜大将军,进爵大安郡公,邑户如旧。”(《周书》卷二〇《阎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43页)“大安郡公”,《北史》卷六一《阎庆传》作“太安郡公”。湖北郧县博物馆藏《太宗第四子魏王泰王妃阎婉墓志》:“妃讳婉,字婉,河南人也,曾祖庆,魏龙骧将军,太安公。”(《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故作“太”是。

5. “选用未定。”(《周书》卷二二《柳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69页)

“未”,《册府》卷七七五同,《北史》卷六四、《通志》卷一五七《柳庆传》作“既”。“未”“既”意思相反,按下文柳庆父僧习谓诸子曰“权贵请托,吾并不用。”则选用结果已出,作“既”是。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ABSTRACTS

(1) Zhang Xuecheng' s Wide Academic Horizons*Chen Qitai* • 12 •

Zhang Xuecheng' s scholarship breaks through the restraints of classics , history , subset and collections , mutually links them together ,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thoughts and conceptions) , inspects the entire academic field and contemporary academic trends ,and stresses “liberal subjects” that differs from those researchers who just focuses on a narrow range. This academic tendency reflects his wide academic horizons and makes him unique among Qianjia scholars. His work *Wen Shi Tong Yi*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reached the heights in his era due to its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 and social life ,getting rid of the old stereotype of commentators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famous contemporary academic scholarship , summariz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of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which results in opening a new roa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and other important areas.

(2)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Perspective of Unified Growth Theory*Guo Xibao Zhen Qize* • 67 •

In perspective of the unified growth theory ,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200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stagnation (before 1949) ,takeoff (1949 ~ 1978) and sustained growth (1978 to present) . The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phases is strikingly characteristic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in which the human capital plays a key rol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one – 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leads to super – fa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 which brings the transfer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hinese population. This super – fa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makes Chinese economy obtain the demographic bonus ahead of time ,yet speeds up population aging and creates heavy adverse effects on China' s futur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us ,the basic path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s to loosen the one – child policy , and to enhance the personnel capital investment.

(3)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radigm , Spatial Morphology Adjustment , and Changes of Urban Functions: Urban Transformation Studies Based o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Huang Nan Li Chenghua* • 77 •

The periodical chang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 and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s of cities are caused by periodic development trends of leading industries and evolu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system.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informatization ,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radigm , the spatial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changes. China' s cities are in the phase of transformation , therefore ,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 to recognize the main direction of China' s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erspective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 to establish the modern industry system meeting the needs of Chinese urban function , to enhance to cultivate the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pace , and to deeply melt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 so as to push forward Chinese urban transformation.

(4) Du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 Innovation Model Combination and Corporat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Xu Libo Shen Kunrong* • 84 •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are two innovation models for pushing forward the corporat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The two models hav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respectively.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may be restricted by a persistence of a single innovation model. There are internal links between the two innovation models. A scientific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models may make them “each perform its functions each see effect” , so a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Fundamentally the choice of innovation models will be affected by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e enterprise insisting 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 orientation will be inclined to choosing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n appa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 orientation , but essentially it is the inherent unity , which supports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models.

(5) Social Quality Orientation: New Issue in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es*Cong Yufei* • 112 •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present ,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ransition goes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 which includes the inherent implication of two kinds of value concept: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weight loss to the equilibrium , the other one is that the social management shifts from life – quality oriented to social – quality oriented. Social quality connotation from Europe gradually embedded in two kinds of steering process , and at the same time